

第3卷

城市文化评论

主编 ● 田根胜 黄忠顺

特约主编 ● 高小康

副主编 ● 阎 江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PDG

第 3 卷
城市文化评论

责任编辑 李道学 欧阳薇

技术编辑 易 平

ISBN 978-7-5360-5623-7



9 787536 056237 >

定价 33.00 元

主 编:田根胜 黄忠顺

特约主编:高小康

副 主 编:阎 江

城市文化评论

第3卷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城市文化评论. 第3卷 / 田根胜, 黄忠顺主编.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7-5360-5623-7

I. 城… II. ①田…②黄… III. 城市—文化—中国
—文集 IV. C912. 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17028 号

责任编辑: 李道学 欧阳蓓
技术编辑: 易 平
装帧设计: 鲁继德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广彩印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3.5
字 数 300,000 字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3.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编者的话

《城市文化评论》编到这一卷的时候,我们感到了一些困难,却也得到了更多作者的支持和学界前辈与朋友的鼓励。在本卷撰稿的作者中,除了国内学者,还有两位韩国学者和一位日本学者。我们珍视他们的支持和鼓励,将努力把它的编得更好。

从全球视野来看,都市化进程是城市化的最新特点与最高表现。本卷“理论视野”一栏刘士林先生的文章《都市化进程的理论与实践》,探讨都市化进程的西方经验和中国实践,分析了中国融入当今世界都市化进程所呈现的种种表现及其复杂性,其着眼点在于从理清“都市化”、“城市化”、“城镇化”的关系入手,思考当前中国城市科学发展的道路。该文既有开阔的理论视野又切近中国当前科学、和谐发展的大主题,值得一读。

青年学者曾军的《市民化进程与城市文化传承》一文,认为城市文化传承中最为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市民化进程中的文化冲突,而“传媒与城市想象”和“双三角论坛”两个栏目中两篇来自韩国的文章:林春城先生的《移民,他者化,身份认同:电影里再现的上海人》、洪锡俊先生的《上海社会的市民文化和新市民阶层:20世纪80年代以后上海都市文化的形成与变化》,也从各自的角度关涉到市民与市民文化这个话题。如果说,在文化的传承变化中,“人的活动”因素至关重要,那么,作为城市文化主体的市民与市民文化理应是我們应予从方方面面深入开掘的话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今城市进程中的衍变,是我们持续关注的话题。与古籍、文物等已经逝去的古代文化残留至今的遗产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态的、可以继续发展的文化形态。这种活态文化逐渐离开传统的文化环境而转入当代都市文化环境中,逐渐从原来的乡土文化变成了都市文化的新元素,如何看待这种文化现象?高小康先生的《非物质遗产与当代都市民俗》对此有别开生面的思考。该文认为,当一些批评者敏锐地注意到这些新民俗产生和运作的商业或政治意图,并根据这些意图来否定新民俗的价值时,往往忽视了使这些意图得以实现的现实文化根据。高小康先生由此依稀看到了当代人在现代性的自我认同发生危机之后产生的某种与大地、诸神和乡土传统重新和解的信息。在“城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栏中,日本学者 Peter Knecht《祭典(节日)与都市化的挑战》、马驰先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是对民间艺人的保护——以浙江海宁硖石灯彩为例》,其个案研究值得称道。

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同,“城市化与博物馆”栏目的三篇文章涉及的是物质文化记忆。其中,许明先生、程洁先生的《上海民间博物馆生存报告》让我们看到的当前民间博物馆的现状与问题来自田野工作的扎实。对当前城市文化的种种状况进行认真的田野观察和社会调查,正是我们这份《城市文化评论》十分看重的工作。

此外,其它栏目也有几篇可推荐的文章,比如“双三角论坛”中曲春景女士的《上海电影与都市化进程》,“形象与诗意”中陶原珂先生的《都市的空间想象》等。限于篇幅,仅此一提。

理论视野

刘士林	都市化进程的理论与实践	2
曾 军	市民化进程与城市文化传承	13
於贤德	论城市环境审美中的主客体关系	21

传媒与城市想象

[韩]林春城	移民,他者化,身份认同:电影里再现的上海人	28
王 晖	城市文化与影像表达 ——以《话说长江》和《再说长江》中的南京为例	39
严前海	影像城市的建立:增魅传播	43

“双三角”论坛

[韩]洪锡俊	上海社会的市民文化和新市民阶层: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上海都市文化的形成与变化	60
曲春景	上海电影与都市化进程	72
周大鸣	论珠江三角洲乡村都市化过程中的三大问题	78
姚朝文	粤港舞狮、舞龙艺术的民俗诗学想象 ——粤港功夫影视中珠三角民众的习俗与精神寄托	95
于爱成	岭南新文化的构建	1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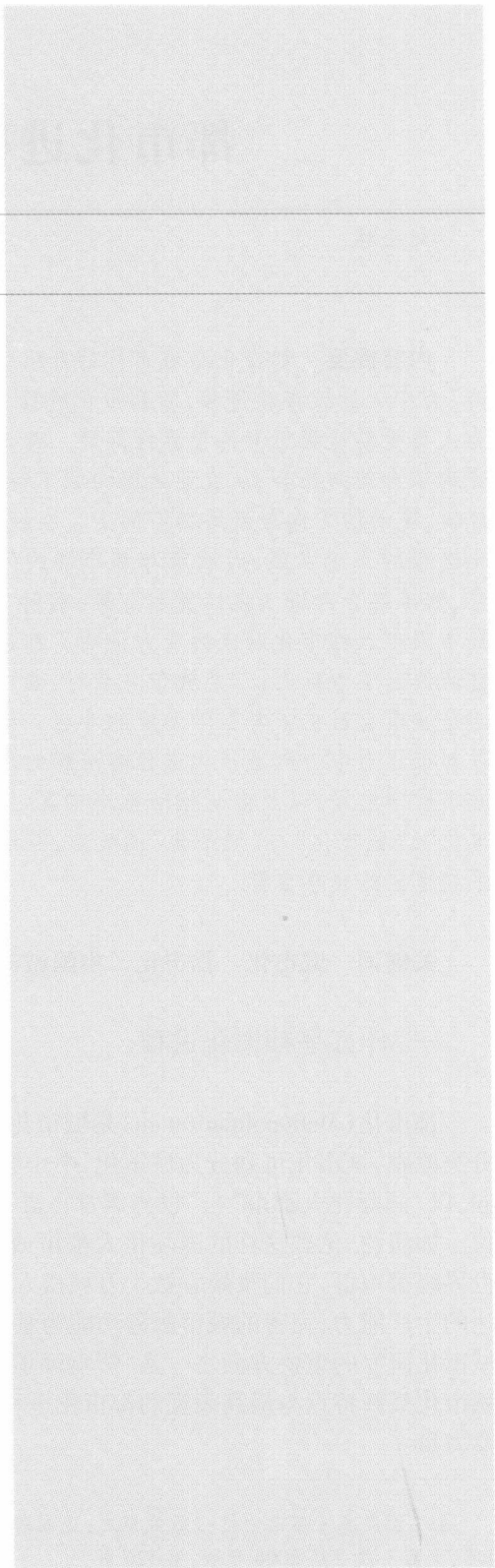
城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高小康	非物质遗产与当代都市民俗	110
[日]Peter Knecht	祭典(节日)与都市化的挑战	119
马 驰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是对民间艺人的保护 ——以浙江海宁硖石灯彩为例	124
宋俊华 王开桃	城市化、市民社会与城市演剧	127

邵一飞	城市的另一种姿态:试论网络民谣	138
凌晓蕾	传统节日的现代转化	146
城市化与博物馆		
许 明 程 洁	上海民间博物馆生存报告	152
田根胜	文化修饰与文化自觉	
	——城市化与博物馆建设	163
张舒屏	双向互动:城市化进程中民间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对长三角地区南通、昆山博物馆群的调查	167
形象与诗意		
陶原珂	都市的空间想象	172
陈 瑜	《长恨歌》与王安忆的“上海故事”	178
阎 江	城市、网络与打工诗歌研究	
	——以东莞为例	185
文化及其相关产业		
王志章 陈 娟	关于发展城市文化产业的研究	
	——以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重庆为例	190
高 芳	文化语用学视野下的创意广告中文化行为的研究	201
征 稿		207

理论视野

LILUNSHIYE



都市化进程的理论与实践

刘士林

内容提要 都市化是城市化的升级版与当代形态。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都市群”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即都市化进程。在现代化的交通与信息技术条件下,都市化进程成为人类需要认真思考的世界性问题。都市化与城市化的共同之处是人力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从自然向社会、从农业地区向城市空间的流动与聚集。其不同主要表现在流动与聚集的规模、流动的方向与聚集的空间上。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都市化进程迅速波及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飞速发展、大城市与都市群的风起云涌、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源向都市空间的高度集中、都市群自身进入良性发展态势、辐射与带动力的提升,以及“十一五”规划的政策导向等,是中国步入都市化时代的有力证明。都市化进程加剧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复杂性:一是农民进城依然压力巨大;二是城市与乡村、城市与城市的矛盾升级;三是工业化与后工业化的冲突;四是城市盲目扩张与科学发展的冲突。如何使之进入科学发展的正确轨道,一是必须对当代以都市化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有清醒的现实意识,这是发现问题的主要与根本矛盾、实现中国城市科学发展,以及由此推动整个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大前提。二是结合中国国情理顺“都市化”、“城市化”与“城镇化”的关系,并根据不同地区、城市的实际情况,分别制定与其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战略目标。

关键词 城市化 都市化 中国城市发展

一、什么是都市化进程

都市化(Metropolitanization)是城市化(Urbanization)的升级版与当代形态。按照一般的分类原则,城市化可划分为城镇化、中小城市化与都市化三类,但与传统的城市化发展道路不同,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都市群”为标志的“都市化”模式在当代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如纽约、伦敦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或“波士沃施”(Bos Wash)、北美五大湖都市群这样的世界级都市群,它们集聚着数千万城市人口和数以万计的高级人才,并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发达的生产能力、完善的城市服务功能为基础,成为全球政治、经济、社会、科技与文化的中心地。城市化研究的重要方面之一是“影响环境和社会变化的机制是怎样的”^①,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城市化最新特点与最高表现的都市化进程,恰好构成了推动当代城市化进程的核心机制与主要力量。

^① 西奥多·赫斯伯格:《新城市史:迈向跨学科的城市史》,载于孙逊:《都市文化研究:都市、帝国与先知》,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26页。



重庆:十年崛起西部大都市

(来源: [http://photo. ce. cn/](http://photo.ce.cn/))

都市是都市化进程的核心与最高成果,对其可从两方面进行界定与阐释:从城市发展史的视角,都市是人类城市历史发展的高级空间形态。在概念辨析的意义上,“都市”不是英语中既可译为“城市”、也可译为“都市”的“Urban”,而是来自希腊词汇、又被诸多西方社会学家使用的“Megalopolis”(“巨大城市”)。尽管直到目前,在谁最先使用 Megalopolis 这个概念等方面仍存在着争议,国内学术界一般认为是戈特曼,而根据西方学者的考证,这个术语在 1820 年代就已经是一个常用词,意为“大城市”,并且在当时主要是一个轻蔑语,以表达城市社会学者对过度城市化的不满与批评。以人本主义学者芒福德为例,他 1938 年出版的《城市文化》(The Culture of Cities)的第四章标题就是“Rise and Fall of Megalopolis”(《大都市群的兴起衰落》)。在芒福德看来,“特大城市”(Megalopolis)与“暴君城”(Tyrannopolis)是城市停止发展、走向衰竭的产物,其特点一是空间环境越来越不适合人们居住与生活,二是人的精

神世界在对金钱与权力的追逐中被彻底扭曲与异化,很显然是在否定的意义上使用的。“Megalopolis”在 20 世纪 80 年代传播到中国,一般被译为“都市群”、“都市圈”(史育龙)、“大都市圈”(张颢瀚、张超)、“大都市带”(周一星)、“大都市连绵区”(王旭)等。尽管这个术语在目前尚无法统一,但其所指称的现实对象十分明确,即作为人类城市发展更高空间形态的“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都市群”。此外,与之有家族类似的是“城市群”(urban agglomerations),由姚士谋在 1992 年提出,是“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具有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以一个或两个特大或大城市作为地区经济的核心,借助于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综合运输网的通达性以及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发生与发展着城市个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由于规模上的差异,也有学者将之细分为以国家级大都市为中心的国家城市群(national urban agglomerations)、以区域性大都市为中心的地区城市群(regional urban agglomerations),以及以地方为中心组织起来的日常城市群(daily urban agglomerations)^①,由于中国城市化及城市一体化的水平比较低,城市群这个概念也有一定的使用范围。

在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都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中,并不是说城镇化、中小城市化等传统城市化模式已不复存在,而是说它们不再占有主导地位,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也每况愈下。另一方面,都市化进程的影响并不限于数量有限的都市人口或大都市与都市群;在现代化的交通与信息技术条件下,都市不仅成为一般中小城市乃至乡村竞相模仿的中心,而且其自身在发展

^① 朱明英:《城市群经济空间分析》,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 页、第 64~65 页。

中所有的优点与存在的问题,也都超越了都市空间乃至民族-国家的界限,成为人类共同的生存境遇以及需要认真思考的世界性问题。都市化进程使人类个体与社会在整体上出现了“都市化”倾向,从主体角度讲,是人自身被再生产为“都市人”。在当代,一个人可能并不直接生活在大都市中,也可以对城市生活方式持激烈的批判与否定态度,但无论是现实中的衣食住行,还是在更高层的文化消费与精神享受上,两者都是不可能绝缘的。从对象角度看,都市社会环境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与个体存在的最新空间形态。在都市里固然存在着许多令人痛苦的问题,如“过度城市化”带来的各种城市危机与城市问题,但这并不能构成反对城市文明、大都市文化的理由与借口,因为正是在城市、特别是在发达的现代化大都市中,才为个体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在乡村、城镇与中小城市不可能有的广阔空间。此外,“都市化进程”也超出了经济社会领域,深刻地影响到精神生产、文化消费乃至审美趣味等。如当代中国影视作品对历史、传统、经典的“解构”与“恶搞”,如都市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对中小城市、甚至边远乡村的渗透与影响等。凡此表明,都市化进程已构成当代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最重要的生活世界。这是相关研究从最初的“大都市经济圈”等,逐渐过渡到都市社会学、都市文化学、都市美学、都市传播等领域的原因。

二、都市化进程的西方经验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都市自身在结构与功能上未能得到充分发育,因而与一般城市的差异并不明显,这既是传统城市发展相对比较均衡,也是今天人们对“城镇化”、“城市化”与“都市化”不加区分的根源。但从200年的城市化经验看,在城市化进程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确乎存在着一个从城市化(civilization)向都市化(metropolitanization)的

飞跃或质变过程。这可以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去了解。

都市化进程在西方始于1960年代前后,其界标是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1961年发表的《都市群:美国城市化的东北部海岸》。他在书中第一次从正面提出了“都市群”(megapolis)概念。在对美国东北部海岸进行了20年研究之后,戈特曼发现这个北起麻省(马萨诸塞州)首府波士顿,南到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地区“极其特殊”:一是高度的城市化。这个后来被称作波士沃施(BosWash)的区域,面积仅占全国的1.5%,人口却占到美国总人口的16%。二是资源与功能的高度集中,波士沃施是美国的政治中心、银行中心、媒体中心、学术中心和移民中心,为全美国提供了为数众多的基本服务。三是作为一个规模空前、内在联系紧密的城市共同体,波士沃施的出现改写了城市化的历史,它既是城市化进程发展到更高阶段的产物,同时也把城市的形态与本质提到更高的历史水平上。如果说,城市化意味着大自然与乡村的各种资源向城市空间集中,并因此直接破坏了农业文明固有的节奏缓慢、安静和谐的田园生活,那么,由于都市化进程带来的是人口与资源向都市空间更高度的集中,因而它不仅继续吸收农村地区的人力与资源,同时也把中小城市纳入自己获取营养的范围,其所带来的各种矛盾与问题,远比一般的城市化进程严重得多。

从理论渊源上讲,关于都市化的讨论可追溯到1932年夏天的一场理论交锋。交锋发生在芒福德和“纽约和市郊区域规划”主任托马斯·亚当斯之间。以托马斯·亚当斯为首的大都市主义者认为,20世纪的城市将保持19世纪城市的形式,其人口可以扩张到一百或二百万以上,其空间可以从城市中心延伸到50英里或更远。以此为基础,他们认为应该把更多的投资投入到大都市中心。而以芒福德为首的区域主义者(regionalists)则认

为,与19世纪的城市相比,20世纪的大都市结构会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不同于单一中心的大都市(monocentric metropolis),大都市区将发展成更加分散的城乡网络,成为一个横跨巨大空间的“城市区域”(urban region)。如果说,托马斯·亚当斯属于“大都市单子论”,那么,在芒福德“城市区域”概念中,已隐约见出戈特曼后来提出的大都市化(Metropolitanization)、大都市带化(Megalopolitanization)的雏形。20世纪美国城市发展的主导趋势证明了这一点。从1920年到1940年,美国大都市区的规模和数量由58个增长到140个,大都市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也上升至47.6%。大都市区成为“全国所有地区的主要发展模式”和社会生活的主体,这是美国学术界称1940年以后为大都市区时代的原因。而大都市区又以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连接的方式,形成了更大规模的“大都市连绵区”(“Megalopolis”)。“大都市连绵区”的出现与发展,是传统城市化模式发生转型与升级的标志,如果说城市化进程主要是发生在城乡之间,那么都市化进程的主要对象是城市与城市,这不仅使已充分发展的现代城市向更大的规模演化,也使众多的单体城市走向高度的一体化。

都市群是人类城市向更高形态发展、演化的产物。但正如芒福德把大都市称作“暴君城”一样,由于城市越大就越不适合人们生存,这是许多人希望对城市规模加以控制的根源。据联合国2001年对190个国家和地区的一项调查,它们中的大多数对城市化加快感到忧虑,有110个国家和地区甚至想减缓或改变现在这种不断加速的趋势,甚至还采取了相应的政策和行动。但其对最终结果影响并不大。如不少人热衷的“逆城市化”理论。在西方1970年代,由于大城市在发展中带来许多社会问题,一度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一些社会学家据此得出大城市走向衰落的结论。但实际上,“这在西方国家只是过渡性的临时现象,

而非城市发展的主导和必然的趋势。……大量数据说明,在美国城市化过程中,大城市一直呈优先发展局面,尤其是在20世纪,大城市在完成竖向发展后,进入横向发展阶段,形成了大都市区和大城市连绵区或大城市带。这种大都市区化,是人口在一个更广范围内或是更高层次上的集中。”^①在现实中也是如此,从1940年到1990年,美国大都市区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大型大都市区的优先增长。据2005年7月《超越大都市带:美国新“大都市带”地理扫描》调查报告,目前美国已出现10个大都市带区域(Megapolitan area),并且大都市出现了“成对”分布的新趋势。美国“第一对大都市带”是东北部和中西部,其成对的大都市为纽约与芝加哥。其他几个分别是,皮德蒙特高原大都市带区域和佛罗里达半岛大都市带区域组成“新南方”对子,其成对大都市为亚特兰大和迈阿密;“大得克萨斯”对子由墨西哥湾沿岸大都市带和I-35走廊组成,其成对大都市为休斯顿和达拉斯;西部的两对大都市带分别是“大峡谷”和埃科透匹亚(Ecotopia),前者由南部陆地大都市带和阳光峡谷都市带组成,成对大都市为洛杉矶和菲尼克斯;后者由北加州大都市带和卡斯卡特大都市带组成,成对大都市为旧金山和西雅图。^②这种成对状分布的新趋势表明大都市群自身在内在机制上更加完善,同时也意味着其发展与增长正在进入良性循环,而衰落的可能性愈加渺茫。

三、都市化与城市化区别及其影响

作为城市化的升级版本与当代形态,都市化与城市化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两者最大

① 王旭:《美国城市化的历史解读》,岳麓书社2003年版序言第3~4页。

② Lang, Robert E. Beyond Megalopolis: Exploring American's New "Megapolitan" Geography, 2005, <http://www.mt.vt.edu/uploads/MegaCensusReport.pdf>, 2006-4-1。

的共同之处是人力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从自然向社会、从农业地区向城市空间的流动与聚集。而两者的不同主要表现在这样几方面。首先是人口的流动与聚集的规模有重大差别。这可以世界城市人口在近两个世纪中的增长来说明。在城市化起步的19世纪初期,世界城市人口十分有限,并且增长缓慢。1800年世界城市人口比例为1%,一百年后为13.6%。如1816年德国城市人口略多于250万,至1895年达到1300万;巴黎在1800年为50万,至1891年达到250万。这个增长数字与20世纪相比则有天壤之别。有关统计表明,1998年世界城市人口迅速上升到47%,比19世纪提高了33.4个百分点。有关预测则表明,2006年城市人口将占到世界总人口的一半。由此可知都市化进程对人类空间聚集规模与方式的巨大影响。其次是流动的方向与聚集的空间有本质不同。都市化意味着人口、资金、信息等社会资源向少数国际化大都市、国家首位城市或区域中心城市高速流动并大规模聚集,这不仅在时间上表现为节奏越来越快,在空间上也呈现出以大城市为中心的新特点。从人口迁移看,2003年,美国10个大都市带区域的居民已超过了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从经济资本看,美国三大都市群(大纽约区、五大湖区、大洛杉矶区)的GDP占到全美国的67%,而日本三大都市群(大东京区、阪神区、名古屋区)的GDP占到全日本的70%。如果说城市化进程直接改变了农业文明及其传统生活方式,那么,都市化进程则导致了文明与自然、城市与乡村以及城市本身全方位的沧桑巨变。

都市化进程尽管肇始于发达国家与地区,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已成为当今人类生存与发展最重要的现实背景。对于不发达国家与地区而言,在都市化进程中的冲击与挟裹下,由于从一开始就丧失了其发展的“自然历史进程”,因而往往表现出更加强烈的都

市化倾向。这当然有无可奈何的成分,因为实际上已不可能再循序渐进、按部就班地走城市化之路。而更为严峻的挑战则是,由于工业经济基础薄弱、城市发展先天不足,特别是时间紧迫、环境复杂等原因,都市化进程给它们带来的往往是巨大的变革阵痛,有些影响甚至是灾难性的。

都市化进程对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这样三方面:

一是大城市的“首位率”(首位度)迅速飙升。首位率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范围内首位城市与第二位城市人口数量之比,表明着其不同规模城市的差异程度。都市化本身意味着人口向国家首位城市或地区中心城市高度集中,它不仅给首位或中心城市带来巨大的压力,也使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地区差异更加明显,因而负面影响十分巨大。以发展中国家的首位率为例,伊朗首都德黑兰的首位率是6.5%,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首位率是8.6%,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首位率是11.6%,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首位率是11.5%,秘鲁首都利马的首位率是13.1%。与之相比,美国纽约、意大利首都罗马、澳大利亚首都悉尼的首位率只有1.7%、1.6%和1.2%。首位率高,既表明国家人口分布的不合理,同时也是社会发展失衡的重要根源所在。这与发展中国家农业人口规模巨大有关。统计表明,1950年,世界上有83个城市人口超过100万,三分之二位于经济发达国家;1990年超过100万的城市为272个,但三分之二都位于发展中国家。如墨西哥首府墨西哥城,1960年人口为500万,到1994年上升为2200万,超过了全国总人口的20%,成为当今世界第一人口大城市。如此大规模人口在都市化进程中的高度集中,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

二是经济发展方式发生重大转向。200多年前开始的都市化进程,依靠的是现代科

学技术与现代工业体系,如自然科学、物理学、化学以及矿山开采、冶铁、蒸汽机、机械工业制造等。工业文明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恶性地损耗了资源、环境与主体的精神世界,使它们无法再承载进一步的发展。与之相比都市化进程最重要的推动力可以称之为后现代工业,如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高科技产业、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等。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差异,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工业基础都比较薄弱,其城市化还需要依靠已过时的现代工业,这使其经济社会发展往往遭遇到双重困境:一方面,要想迅速完成“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就必须花大力气发展现代科学技术与工业系统,但另一方面,由于资源的短缺以及发展环境等方面存在的障碍,又必须对工业化本身进行反思、批判与超越。以中国为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GDP 翻了两番,但它的代价也是巨大的,不仅其“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严重地污染与破坏了环境,更令人担忧的则是在此基础上的“扭曲的经济结构”。前者如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所说:“中国的环境问题已不是什么‘隐约逼近的危机’,而是一个已到眼前的危机。我们一直说要搞好环境造福后代子孙,实际上是我们这代人能否安然度过的问题。”^①后者如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指出:“如果不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扭曲的经济结构不仅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校正,相反还要有继续恶化的可能。”^②如何改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

三是“城市发展”更加复杂。在都市化进程中,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问题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模式与实践面临更多的挑战。以印度为例,由于都市化进程带来的机遇,2003 年其经济增长率仅次于中国达到 8%,并在代表未来工业发展方向的计算机软件产业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所以瓦杰帕伊在竞选中雄心勃勃地

提出 2020 年把印度变成世界超级经济大国,还提出“宝石”计划,即把几个大城市建成国际化大都市。但都市化进程也使印度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在印度 10.5 亿人口中,80% 以上是连自行车都买不起的“牛车经济”,15% 是“两轮车经济”(小型摩托车),而享受“飞机经济”的只有 2%。贫富差距的拉大,不仅成为印度社会的顽疾,也使执政 6 年的印度人民党在 2004 年大选中惨败。都市化进程还带来一些具有自身特色的新问题。如由于人口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与集中,使原本因分散居住而相对平静的种族、文明、地区矛盾日益激化,2005 年法国巴黎地区的社会骚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如都市化进程不仅使传统乡村社会的有机性进一步衰落,也使现代社会学家一直关注的“城市社区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如都市人自身的精神生态与心理问题。如果说,城市化进程已经给人类带来过多的现实问题,如城市社会学家经常讲的“社会解体”、“道德上冷漠无情”、“政治上不负责任”、“人格被贬低”等,那么,在迅速的都市化进程中,这些问题同样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方式迅速地滋生与蔓延着,并直接影响到都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四、中国融入都市化进程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都市化进程迅速波及中国,它的主要特征有二:一是城市化列车驶入快车道,这在中国恰好是以千年之交的 2000 年为界标——这一年中国城市化水平达到 36.09%,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 800 美元,两项指标表明中国城市化开始驶上快车道;二是城市资源的迅速膨胀。目前中

① 潘岳:《中国环境问题的根源是我们扭曲的发展观》,《环境保护》2005 年第 6 期。

② 马凯:《改革:参与和思考》,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92 页。

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70%, 国家税收的 80%, 第三产业增加值的 58%, 高等教育和科研力量的 90% 以上, 都集中在城市。城市在对中国社会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同时, 也为它自身向更高形态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近几年来, 越来越多的数据、理论与现实经验表明, 中国正迅速地融入当今世界的都市化进程。具体表现在这样几方面:

一是城市化进程不断提速, 大城市发展势头强劲。据国家统计局对 25 个省市区 1% 人口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 2005 年浙江省城市化水平达到 56%, 高于世界 47% 的平均水平 9 个百分点, 高于全国 43% 的平均水平 13 个百分点。另有消息表明, 福建厦门在 2010 年城市化水平将达到 75%, 而广东珠海在 2010 年城市化水平将达到 93%, 后一个数据与世界城市化水平最高的英国已不相上下。与此同时, 大城市在都市化进程上正在成为主角。据建设部最近发布的有关数据, 1978 年至 2003 年, 中国 100 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从 13 个增加到 49 个, 50 万至 100 万人的大城市从 27 个增加到 78 个。而据 2006 年《中国城市发展问题观察》的预测, 到 2010 年, 中国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将达到 125 个左右, 其中 200 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将达到 50 个左右。如此大规模人口在中国地理空间的迁移与变动, 其对中国社会的重要影响是自不待言的。

二是随着大城市数量与规模的不断扩展, 作为其更高形态的“都市群”(城市群)开始“扎堆”出现, 并全面“开花”。大城市与特大城市的迅速发展, 也包括中等城市的不俗表现(从 1978 年至 2003 年, 全国 20 万至 50 万人的中等城市从 59 个增加到 213 个), 为中国都市群的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积累了雄厚的资源。在 2000 年以前, 人们知道的中国都市群只有长三角、珠三角与京津冀, 如果加上山东半岛与辽中半岛, 最多也不过 5 个。但据 2006 年《城市竞争力蓝皮书: 中国城市竞

争力报告 No. 4》, 目前已纳入中国城市群竞争力排名榜的就达到 15 个之多, 按排名顺序依次是: 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半岛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徐州城市群、武汉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哈尔滨城市群、关中城市群、长春城市群、合肥城市群。同时也有研究报告预测, 到 2020 年, 中国将出现 18 个都市群, 其中包括西部的兰州都市群等。由于都市群具有的巨大规模效应与带动作用, 其影响也波及到西部城市化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 如广西已制定并启动了“南北钦防北部湾城市群”发展规划。

三是与相对均衡的城市化模式不同, 在都市化进程中, 各种高效优质的发展资源高度集中于区域中心城市、国家首位城市以及先行发展的都市群。以首位城市北京为例, 其占有科研资源的主要数据为: 28% 的国家重点实验室, 32% 的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45% 的国家重大科学工程, 30% 的国家重点学科, 41% 的国家基础研究项目, 32% 的 863 计划项目, 35% 的科技攻关计划。此外还有 673 位两院院士, 这个数字占到全国的 50.9%。以区域中心城市为例, 安徽全省 99% 的博士、63% 的科技人员、58% 的科技经费和 70% 以上的专利都集中在合肥。以中国三大大都市群为例, 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的国土面积占全国的 2%, 而人口和 GDP 则占到全国 12% 和 38%。有预测表明, 2020 年前后, 三大都市群的人口和 GDP 将分别上升到全国 1/6 和 50%。另据有关专家的研究, 中国目前已形成的都市群达到 11 个, 其国土面积占全国 6.3%, 而人口与 GDP 在 2002 年分别占全国的 30% 和 60%。^① 以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总部经济与大型企业为例, 据最新统计, 上海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已达 104 家, 而 2005 年中

^① 牛凤瑞:《集中型的城市化是中国必由之路》, 新浪网, 2006 年 5 月 24 日。

国企业 500 强中有 120 多家位于长三角,其中上海 44 家,浙江 42 家,江苏 40 家。甚至在电视剧《我主沉浮》中,企业巨头对省长的威胁也是“要把总部搬迁到上海去”。

四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育和磨合之后,中国都市群自身逐渐走上健康发展之路。以长三角为例,早在 1982 年,国家领导人提出“以上海为中心建立长三角经济圈”,四年后扩大到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一市,并在中央政府协调下建立“省市长联席会议”,以及由各省、市抽调人员成立了“上海经济区办公室”。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红极一时的长三角经济圈却突然无疾而终。尽管这既有行政区划的原因,也有现实利益的冲突,但与当时中国城市化水平较低,特别是对于建设都市群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直接相关。在 1993 年上海重启长三角大都市圈发展模式之后,尽管江苏、浙江、上海两省一市依旧存在着诸多的矛盾、冲突与不和谐,如人们普遍注意到的“产业同构”与



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

(来源: <http://www.news365.com.cn>)

“同质竞争”,以及在通信、金融、企业服务、旅游、污染治理和生态建设等方面的“各自为政”等,但正是借助于都市化进程,才使得原本“貌合神离”的长三角“破镜重圆”,并出现了城市布局日趋合理,功能定位日趋完善,以及政治协商与对话机制不断健全的良好区域融合态势。内在机制的不断完善是建设环境

友好城市共同体的重要保障,对于全面提高区域综合竞争力、实现城市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意义深远。

五是城市群的辐射与带动作用越来越突出。从著名学者吴良镛教授提出“大北京都市圈”的发展构架学说,到 2006 年《中国城市发展问题观察》提出把“城市群发展列入国家发展战略”,以及建设部重点规划武汉城市圈、中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和皖江城市带 4 大城市群,以便使中国中部地区迅速融入都市化进程,都是因为城市群的发展具有广阔的辐射功能与巨大的带动作用。在现实实践中也是如此。在都市化进程中高度集中的人力与资源,可以极大地提升中心城市的综合竞争力。而中心城市的做大做强,对整个城市群的良好性与和谐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中国而言,由于受都市化进程的影响较大,东部地区城市与城市群的发展也要健康得多。研究表明,中国西部地区城市的首位率远远高于东部。这既是如安徽的马鞍山等城市纷纷接轨长三角的原因,也是如徐州这样的苏北城市主动接受上海辐射的根源。另一方面,这也表现在中国三大都市群对其周边农村地区的辐射与带动上。据《中国新农村建设报告(2006)》蓝皮书,在中国都市化水平最高的上海、北京、天津的周边,基本上形成了大城市郊区型农村,其新农村建设起点水平远高于其他地区。而都市化水平较低的西藏和贵州,也是新农村建设起点最低的地区。

六是从发展前景上看,在《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首次提出了“城市群”的概念,明确要求“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要继续发挥对内地经济发展的带动和辐射作用,加强区内城市的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增强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以及在“有条件的区域,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龙头,通过统筹规划,形成若干用地少、就业多、要素集聚能力强、人口合理分布的新城市

群”。这不仅是对过去以发展中小城市、城镇为主导的城镇化战略的重要补充与调整,也是对中国城市在都市化进程中如何发展的理论创新与积极肯定。从理论上讲,在2002年由上海证大研究所提供的一份研究报告已指出:由于三种矛盾——“环境、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城乡之间的矛盾”、“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在中国已到了“非得城市化才能解决的程度”,其首要发展路径即“以大城市为主的城市化发展道路”。^① 包括学术界集中型城市化道路的理论,也涉及到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都市群”为中心的城市化模式与思路。正如两院院士、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周干峙所说:“如果说大都市的出现是早期城市化的一个突出现象,那么,城市密集地区(或都市连绵地区)则是现代城市化中的新特点。”而且他明确指出,“在经济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京津塘地区等无疑已经出现城镇密集连绵的地区”。^② 从理论联系实际的角度,中国城市群的主要问题是发展不足,在机制与形态上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因而最关键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发展城市群,而是如何把它们真正地做大做强。在这个意义上,“城市群”在“十一五”规划中的出场,具有十分重要而及时的现实意义,这不仅有利于中国大都市与都市群的培育与建设,对于实现农村、城镇与大城市、都市群的和谐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化进程的飞速发展、大城市与都市群的风起云涌、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源向都市空间的高度集中、都市群自身进入良性发展态势、辐射与带动力的提升,以及十一五规划的政策导向等,正在中国大地上汇聚成一种新的发展潮流,这是中国步入都市化时代的有力证明。

五、中国和平发展的重大机遇与挑战

在欧洲,19世纪是城市大发展的年代;中

国则在21世纪迎来了它的都市化进程。

传统社会发展比较平稳有序,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人口规模有限;二是人口分布相对均衡。农业社会自不必言,即使在西欧和美国开始城市化时,其人口压力也不是很大,“工业化和对自然资源利用的速度达到了足以维持新增人口和原有人口生计的水平”^③,走的是一条发展比较均衡、节奏比较适度的城市化之路。在以后200多年的城市化历史中,不断有新的民族与国家被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大潮挟裹进来。正所谓“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受城市化不断加速与都市化进程的影响,这些国家与地区已不可能再走传统的“城市化”之路,“贫穷、人口增长太快、城市化过度以及文化的急剧变动”,成为城市化进程带给它们的普遍问题,甚至是噩梦。中国属于较晚参与这一历史进程的国家,加上其农业人口数量大、工业经济基础薄弱、城市设施与管理落后,以及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局势格外复杂等原因,其现代化进程本已行进得十分艰难,而都市化进程的突然来临,无疑更加剧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复杂性。这主要表现在这样几方面:

一是农民进城依然压力巨大。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已有几亿农民成为城市居民,但由于农业人口基数巨大,中国在未来若干年内的城市化任务依然十分艰巨。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6年8月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问题观察》预测,在未来20年内,中国将有三亿左右农民进入城镇。而据《经济观察报》研究院2006发布的《中国城市人口增长周期研究报告》,截至2005年底,中国的城市人口比例

^① 上海证大研究所:《长江边的中国——大上海国际都市圈建设与国家发展战略》,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② 周干峙:《走具有自己特色的城市化道路》,中国城市网,2006-8-3。

^③ 康少邦、张宁等编译:《城市社会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7页。